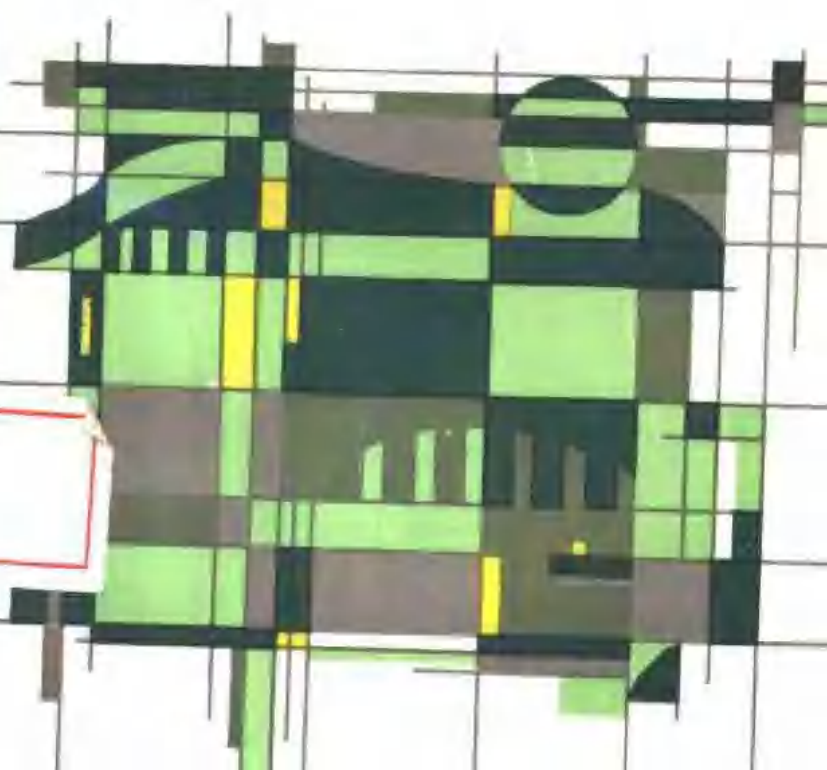


五 / 色 / 石 / 文 / 丛

WUSESHI WENCONG

人之患

钱理群 著



57
7

人之患

钱理群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1号

责任编辑：蒋 恒

封面设计：孙 璐

责任校对：朱晓阳

人 之 患

钱理群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边)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5 插页2 字数7.1万 印数1—2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0960-5/G·223 定 价：2.60 元

序

我这个人大概确实缺乏文人的雅趣：琴棋书画样样不会且不说，连为自己的文集取一个有点“意味”的题目也犯难了好半天。还是友人平原君为我解了围，他指着我的——篇文章说：就叫“人之患”吧。

在这篇《离题的追念》里，我坦白承认：尽管有人称我为“学者”，“我却更愿意人们把我看作‘老师’”，这“更是我的钟爱，我的追求，更适合我的内在气质”。那么，借用一下“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句孟老夫子的古话，对于我，既是写实，又是自嘲，该是恰当的。

当然，也还有别的“意思”，即所谓“引申义”。比如，我就经常感到在中国做“人”之难。处在“人伦”关系网中，每当提笔写作时，总是觉得身后站着许多人——我的前辈（父母、兄长、老师……）与同辈人，他们养育、发现、塑造了“我”，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给我以支持与鼓励，这种“恩惠”对于我都成了一种精神的威压；另一

面我又时时感到身前也站着许多年青的朋友——我寄希望于他们，似乎又自觉承担了某种义务与责任。正是承受着上下两代人（及同代人）的压力，我常有“生命不堪重负”之感，惟有靠写作来自寻摆脱。每写完一篇这类追怀文章，我总有一种轻松感。尽管明知“还债”之类的想法不够“现代”，在另一种眼光看来，不免有“自作多情”之嫌，但我因此而获得某种精神的自我调节，确是真的。

但真要摆脱“人之患”，使自己彻底轻松，似乎也做不到。我及我的同代人获得真正的“人”的感觉的时间本也不长，那“夹着尾巴过日子”的历史仍然梦魇般压在心上，形成了不无病态的自卑、自审以至自虐心理。另一面，用“人”的自觉意识去重新观察周围的世界，思考民族与国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却又增添了无穷的忧患……

正像我在一篇文章里所引述的周作人的话，这乃是一种“东洋人的悲哀”；在难以言传的悲哀与压抑之苦的背后，却也内含着淡淡的喜悦与生命的充实感，是一个相当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我原想从鲁迅“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两句中摘出“秋肃春温”四字为这本集子命名，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无论如何，这代

人毕竟活得太累，在这一切趋向“轻”化的时代，自是不合时宜。因此，在我写下“人之患”这个题目时，非但没有任何神圣感，却有几分自我调侃的意味，仿佛是“杞人忧天”。既是自我生命的一个部分，也就借此机会将它“埋葬”了事，如此而已。

1992年11月26日凌晨2时

目录

序

悠悠岁月

一切都从那时开始	1
离题的追念	3
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	7
我还感觉得到他的手温	10
我的那间小屋	18
痛悼同代人的“死”	24
我对大学生们如是说	29
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	33
哭好哥	37
哦，你是我的父亲！	57

漫漫长河

“世故人情”中的智慧	67
“父父子子”里的文化	73
“说东道西”的姿态	75

“乡风市声”的意味	94
沉沉默想	109
启蒙者的两难选择	111
两代人的心理阴影	117
漫说“现代文化名人研究”	127
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	135

第一辑

悠悠岁月



一切都从那时开始

本年初收到了一封信，一看信封地址，手就微微一颤，是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寄来的。待读到信中开头几句话：“今年是本校少年先锋队成立40周年，你是第一任大队长……”，心头竟滚过一阵热浪，久不能息。我知道如果就此信笔写下回忆，定是前言不搭后语；想稍“压”一时，不料竟至近半年时间。此时再提笔，也仍不免颠三倒四，一点办法也没有……

该从何说起呢？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要纠正信中的一处“错误”：我们当时建队时的名称是“中国少年儿童队”，大概后来才改名为“先锋队”的吧。名称自然并不要紧，对它的实质的理解也许更有意义。说起来当时的观念也很简单、朴素：“我们是新中国的小主人翁，少儿队是我们自己的组织”。这种主人翁感，是建国初期的时代情绪，今天回味那处处以“小主人”自居的劲头，仍怦然心动。于是，成立“学生会”（这大概是为建立少儿队作准备），也不愿由老师指定，而

先要“竞选”一番。我被班上同学推为候选人，自己发表竞选演讲不说，同学们还组织了“竞选团”，到处张贴标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竞选团的小伙伴们在老师的帮助下，制作了一条大横幅，写着“请投钱大头一票”几个大字，这是用我的外貌特征来吸引“选民”。我的竞选对手自不甘落后，第二天也挂出“请投丁大鼻子一票”的横幅，不过“轰动效应”已减少了很多。也许是我的演说词动人，也许是因为竞选方式新颖，最后，我以多数票当选了。学生会成立，自然要组织许多活动。我现在还记得的是曾引起很大反响的“演戏”。演的第一出戏，是由我和同班女同学钱平凯（她现在在北京邮电学院任教）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一群流浪儿》，这是反映旧中国儿童不幸遭遇的悲剧，我演小牛，平凯扮小凤，还有一位仿佛叫陈明的女同学演瞎了眼睛的姐姐，演得十分动情，每次演出都“赚”了观众（包括老师）不少眼泪。从此，我和平凯都成了“三名”（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人物。为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又自编、自导、自演了《大家都来买公债》的短剧，到江苏省广播电台广播演出。以后，还演过名为《红孩子》的童话剧，主角红孩子自然是我，还有白孩子，黑孩子……等等。学生一带头，老师们也跃跃欲试，好像是

由当时教图画的杨鸿仪老师主持，排演了一出大型哑剧《和平鸽》，我这回自然当不了主要演员，只扮了一个小地主的反面角色。演出后的合影，我至今还保留着，算是永久的纪念吧。以后大概就是筹备少年儿童队的成立了。记得当时主要是进行“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每一次有一个中心主题，把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统一起来。例如，在“爱祖国周”，语文课选读有关文学作品，历史课讲祖国历史，地理课介绍祖国地理，课外活动举行歌颂祖国的诗歌朗诵会、演讲会等等。这些活动都强调学生自我教育，我们这些学生会、少儿队筹委会的“头儿”都是直接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的。学校少年儿童队正式成立的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大概是在1949年底。记得我们学校是南京市最早成立少儿队组织的，在我当选第一任大队长后，还到许多学校去介绍经验。有了自己的组织，学校的活动就更频繁，也更有生气了。印象最深的是所谓“小先生”活动，将家住在学校周围的失学儿童组织起来（这种因要负担家庭不能读书的儿童在解放初期是不少的），在课余时间给他们上课。记得我被推为“小先生学校”的首任校长，还煞有介事地正式聘任了班主任、任课教员等

等。开始大家都没有经验，记得有一位姓徐的四年级女同学，担任“小先生学校”一年级语文教员，她上第一堂课，打开书就哇啦哇啦念课文，也不管学生是否接受，不到下课时间就把一册教科书教完了，不知下面该怎么讲，就丢下学生，哭着跑来向我这位“校长”“请示”。我也没有办法，只好一起去请教老师，即我们的学生的“太老师”。后来“学校”大概就逐渐走上了正轨。记得有一位卖冰棍（南京叫“冰棒”）的学生，毕业后还专门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着“敬爱的钱老师留念”几个字，这幅画我一直珍藏着，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真有些可惜。——尽管我现在是大学教授，学生已算不少，但最令人感怀的，还是这位学生和他的感谢，因为这毕竟是“第一个”。

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且是那样的美好，它给我留下的记忆与影响是真正刻骨铭心，融入血肉的。真的，不管人生路上会遇到什么曲折，我始终坚信：人生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因为我曾经有过那样的人生，那样的青春。

1989年6月21日

离题的追念

因为写了几本书，于是有人称我为“学者”，但我却更愿意人们把我看作“老师”。

“老师”，更是我的钟爱，我的追求，更适合我的内在气质。有朋友说，听我讲课，比看我的书，印象要深刻得多，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的学术著作，其实并非严格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一种“教师”的讲授：那处处都可以察觉到的强烈的“宣讲”欲，那滔滔不绝的语势，以及过于明晰的表达和特意强调的语气……无不闪动着一个沉醉于自己职业趣味的教师的影子。更有意思的是，我的研究，竟也遵循着“教学相长”的原则。青年朋友（其中许多人都自称我的学生），既是我的著作的接受者，又是共同创造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参加了我的研究工作的全过程。我的研究的起点往往不是独自的沉思默想，而是在书房的高谈阔论之中：我常从与青年朋友的交谈中，获得灵感，产生最初的思想萌芽，以至原始的创作冲动；而我一旦酝酿着某种

想法，又总是迫不及待地向来访的青年朋友（熟悉的与不熟悉的）倾诉，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重复，正是在这重复叙述过程中，自己的思想逐渐明晰起来，同时在谈话对象的不断补充中获得丰富与发展。因此，待到一切成竹在胸，奋笔直书时，我所写下的，早已不单纯是个人的创造。至于在讲课过程中，直接从学生那里获得反馈，更是常有的事；在将讲义整理成书时，我喜欢引用学生作业中的观点，这正是出于对学生劳动的尊重与感激之情。我常说，离开了青年朋友、学生，我将一事无成，这绝非夸大之辞。

文章写到这里，我才发现，自己的笔早已离题千里。写本文的目的是要追念我的启蒙老师，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大石桥南师附小的吴馨先生，但我竟然没完没了地分析自己。

我又似乎没有离题。因为我的教师职业兴趣是吴馨先生培养的，我的教师气质也是吴馨先生发现的。

可我却又无法具体地说出：吴馨先生是怎样发现与培养了“教师”的“我”。我甚至对吴馨先生言行的记忆都已模糊，无法一一写出他对我的种种教诲；永远铭刻在我心上的，却是吴馨先生炯炯的目光，幼年的我常常在那里看到了令我神往的热情与坚毅，在我成为又一个“先生”时，

我才懂得，那热情与坚毅，来自先生对自己所从事的教师事业的挚爱与自信。而让我永远难忘的是，有一天，这闪烁着热情与坚毅的目光对准了我，先生对我说：“学校办了小先生班，教学校附近的失学儿童识字，你去上课吧”！再没有更多的话，先生就走了，只留我一个人愣在那里。直到十多年后走上真正的讲台时，我才明白，先生“不多说一句话”正是一种真正的教学艺术，其实我在当时就已经从中感受到了先生对我的绝对信任，进而自己战胜了内心的胆怯，毅然担起了“小先生”的重任，而且这重担一直肩负到现在。

我对吴馨先生的追忆，仅此而已。别的什么，几乎已无记忆。先生确实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至今仍让我追怀不已的教诲，他对我的影响是了无痕迹的潜移默化；而这，正是教师的全部魅力所在。

于是，我对先生的追念只能离题，不断地说我自己；而说我自己，也正是在说先生，因为先生的一切已经内化在我的身上了。

1991年12月

• 9 •